



Title	莫高窟第409窟供养人回鹘文题记研究
Author(s)	依明, 吐送江; 肉斯台木江, 阿不都日衣木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23, 38, p. 9-22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95256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莫高窟第 409 窟供养人回鹘文题记研究

吐送江·依明^{*}

阿不都日衣木·肉斯台木江^{**}

1. 莫高窟第 409 窟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莫高窟第 409 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崖面偏北第三层，为一中小型窟，保留有主室及甬道。主室形制为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于西壁开一龕。关于该窟营建时代，《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将之定为西夏，清重修⁽¹⁾；后来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又将之更正为五代，回鹘、清重修⁽²⁾。而学界对于该窟的营建时代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要之有西夏窟和回鹘窟两大立场，其中回鹘窟的判定又分为沙洲回鹘和西州回鹘两种观点。石窟营建时代的判定依据是多样的，但终归离不开与石窟相关的一切实物遗存及与之对应的认识和判断。

莫高窟第 409 窟于西壁开一内外层方口龕，主尊为趺坐佛，由内而外依次为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龕下南侧塑有乘象普贤一身、北侧塑乘狮文殊一身。这些塑像都在清代被重修或重塑，难以当作石窟营建时代的参考依据。龕顶绘有菩提宝盖和二飞天。内层龕西壁正中亦即佛像身后为菩提树，两侧为花卉，南北壁亦各画花卉。外层龕西、南、北壁皆为千佛。龕下绘有供器及两侧供养菩萨。龕外南、北壁上画垂幔，中画千佛。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最为研究者所关注，也是判断该窟营建时代的主要依据。门南侧主体部分为一男性供养人，该供养人身形高大，脸型较为丰满。头戴典型的回鹘式头冠，有形似莲花花瓣或称之为桃形的装饰，额下系结，垂带垂腰。身穿圆领窄袖绛红色质地（现已变色为黑色）的团龙纹长袍，衣叉处露出绿色的衣里。腰束盘带上佩有短刀、砺石、解结锥、荷包、火石袋等鞬鞞。脚蹬白色毡靴，立于地毯上。手持供养香炉，上方烟云袅袅。该供养人像身侧有题榜一方，但文字已漫漶不清。身前站立一少年，所着衣服与之相同，但长袍上面没有图案。供养人身后还跟随有八身侍从，皆头戴上宽下窄扇面状毡帽，身穿圆领窄袖短袍，颜色各有不同。腰间系带，足蹬毡靴，皆为白色。分别举着权杖、背盾、张伞盖、执龙纹扇、捧刀、弓、剑、箭、铁爪篱等武器。与之对应的门北则绘有女性供养人两身，身形及脸型亦较为丰满，双鬓抱面，上插花钗、步摇等。头上立一桃形冠，并镶嵌绿色宝珠。双耳佩环垂珠饰。这两身女性供养人皆身着同样的长袍，颜色鲜艳，未见纹饰，手中捧着花卉。靠近门口处有一小儿，上身裸露，右手高举着花束，正回头张望。门两侧供养人像呈男左女右分布，皆向着西壁主尊方向侧身而立，虔诚供养。可以说，对此处供养人身份的

^{*}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Tursunjan IMIN.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Abdurehim RUSTAMJAN.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Institute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Dunhuang Academy）

(1)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150 页。

(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167 页。

判定,尤其是东壁门南供养人的身份对于研究和考察石窟族属和地方政权研究至关重要。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历时三个月的考察后,将包括409窟在内的88个石窟从宋代石窟中划分出来,界定为西夏石窟。依据史书中1035年元昊“遂取瓜沙肃三州”记载⁽³⁾及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石窟中一些衣着独特的供养人被定义为西夏供养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2年版)、《敦煌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等早期著作中均沿用此观点。后有一些学者如史金波、汤晓芳、任怀晟继承此观点,认为第409窟供养人为西夏国王⁽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部分学者开始对这种观点产生质疑。1985年段文杰先生在《晚期的莫高窟艺术》一文指出西夏中期出现了“回鹘王及其侍从”的肖像,与高昌时期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回鹘供养人造型相差无几⁽⁵⁾。1987年刘玉权先生在《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一文中将从敦煌石窟中划分出23个回鹘窟,并将409窟归为沙州回鹘后期石窟,归纳出沙州回鹘后期石窟的形制则更为接近高昌回鹘艺术风格,并且指出409窟供养人系回鹘可汗。在《略论西夏壁画艺术》一文中指出因存在争议,将供养人解释为“北方少数民族领袖”⁽⁶⁾。1996年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介绍409窟时,明确将供养人称为回鹘王、回鹘王子和回鹘王妃,表明其民族属性⁽⁷⁾。沙武田也认为其为“回鹘国王与王妃礼佛图”,应为出于当时统治沙州需要而绘的写真类画像,但是难以明确究竟属于哪一个回鹘统治集团⁽⁸⁾。谢静、谢生保联合撰文,通过与高昌回鹘人、西夏人服饰比对,进一步阐明了沙州回鹘与西夏供养人的区别,证明409窟供养人为沙州回鹘王⁽⁹⁾。竺小恩将409窟供养人划归沙州回鹘供养人讨论,通过对服饰艺术的全面分析,说明沙州回鹘供养人与高昌回鹘供养人服饰特征极

(3) (元)脱脱撰《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94页。

(4) 195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壁画:西夏元》推测409窟中男供养人为“西夏王族”。1985,陈炳应先生在专著《西夏文物研究》中列出一张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表,把莫高窟409窟列入西夏窟。史金波、白滨、吴峰云所著的《西夏文物》也收录了此图,对该图的名称明确为“西夏王供养像”。史金波通过分析西夏《天盛律令》中对于服饰的规定和西夏崇龙的习俗,认为若非西夏皇帝身着龙袍则属于僭越行为,证明该供养人为西夏王。汤晓芳于《对敦煌409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一文推敲409窟回鹘王身份,从团龙纹、翠扇等图像出发细致比对,证明409窟男供养人为西夏王。任怀晟于《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一文中,细致分析供养人的团龙纹袍、须眉及五官和发饰,并西回鹘进行比较,确认409窟供养人为西夏皇帝。

(5) 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18页+第123-126页。

(6) 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期,第100-110页;《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318页;《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摘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第9-11页;《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讨论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沙州回鹘的石窟艺术》,载《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16-267页;《略论西夏壁画艺术》,载《宁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8) 沙武田《敦煌写真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第43-62页。

(9) 谢静,谢生保《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0-85页+122-123页。

其相似,联系紧密⁽¹⁰⁾。刘人铭撰文爬梳不同观点,比对同时期供养像图像,以详实的材料支持回鹘可汗可敦为沙洲镇国夫妇⁽¹¹⁾。杨富学撰文支持 409 窟为沙州回鹘时期开凿石窟,指出 409 窟供养人虽与西回鹘国可汗存在共性,但是二者并无隶属关系⁽¹²⁾。

1982 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承认该供养人的回鹘属性的基础上,于《敦煌石窟寺院》一书的书评中最早指出 409 窟供养人为西回鹘国王⁽¹³⁾。并于 2000 年撰文以其服饰与柏孜克里克石窟极其相似而重申这个观点⁽¹⁴⁾。2006 年经考察对 409 窟供养人身侧的题记开头处初步解读为 il(~el),且认为字体属于西回鹘时期的半楷体⁽¹⁵⁾。2014 年,松井太将 409 窟供养人题记的解读为 ɪel alsran xan ɣmǎn sävg(i) --- “(这是) 頡=阿思兰(alsran<arslan)=汗。我, 娑匐克……”,判断字体为蒙古时代的“工整草书体”,推测是一位名叫娑匐克的人将此处描绘的“回鹘王”认作西回鹘王⁽¹⁶⁾。刘永增撰文支持回鹘王为西回鹘王一说,且推断石窟重修年代为 11 世纪,系西州回鹘与沙州回鹘协同完成⁽¹⁷⁾。

2. 莫高窟第 409 窟回鹘供养人研究综述

(1) 莫高窟第 409 窟回鹘供养人研究综述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关于回鹘供养人情况的介绍如上。陈炳应在《西夏文物研究》中写到:在莫高窟第 409 窟中有一幅国王及其侍从的供养像,王头戴白毡高帽,身穿圆领开片团龙襴衫,脚着毡靴。侍从武士戴上大小不同的毡帽,垂红结绶,穿襦衣白裤,束重带,垂蹠蹠,背圆盾,持铁爪篱,很有特色⁽¹⁸⁾。

刘玉权在《略论西夏的壁画艺术》中也有对供养人像的描述:如莫高窟第 409 窟东壁与第 237 窟甬道内两侧壁的供养人像,面形浑圆,身体丰满壮实,柳目修鼻,八字胡须;身着圆领窄袖团龙长袍,脚蹬毡靴,腰束带,上佩解结锥、短刀、荷包等所谓的蹠蹠七事。他认为,这些供养人像具有非常鲜明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象特征⁽¹⁹⁾。任怀晟《敦煌莫高窟 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考》所介绍的

(10) 竺小恩《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38—42 页。

(11) 刘人铭《敦煌石窟回鹘王像身份属性再思考》,《中国美术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5—23+84 页。

(12) 杨富学《莫高窟第 409 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兼评西夏说与西州回鹘说》,《美术大观》2022 年第 2 期,第 42—47 页。

(13) 森安孝夫《柳宗玄与金冈照光《敦煌石窟寺院》(世界的圣域别卷 2) 书评》,载《季刊东西交涉》1-3, 1982 年第 9 期,第 28 页。

(14) 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 15 号,2000 年,第 25 页;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年,第 361,372—373 页。

(15) 森安孝夫《2006 年度内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查行动记录》,《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东京:汲古书院,2011 年,第 524 页。

(16)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関する劄记(二)》,《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 32 号,第 27—30 页;松井太著,刘宏梅译《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劄记(二)》,《吐鲁番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17—127 页。

(17) 刘永增《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 年第 3 期,第 4—14+108 页。

(18)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2 页。

(19) 刘玉权《略论西夏的壁画艺术》,载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14 页。在这篇文章之中,刘认为根据考古类型学(同脚注 5 中刘文所提及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划分的西夏石窟中,早期

供养人画像内容是目前所见文章之中最为详细的一篇。文中主要详细介绍的点在于团龙纹和冠帽，而这也是本篇文章论述的重点⁽²⁰⁾。本文关于供养人图像值得提及的观点如下：409窟与新疆石窟供养人的冠帽样式，佩戴方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且两者的须眉五官、发式等也是不同的。

贾应逸、侯世新所撰《莫高窟409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一文中也有对供养像内容的详细介绍，但是相较于上述内容，并未发现新奇的地方。但本文对供养人图像的内容表达了一些新的看法，如下：

- (1) 新疆地区洞窟10世纪左右供养人像的衣冠服饰与莫高窟409窟的供养人像显然不同；到了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有一些洞窟的供养人像与莫高窟409窟的回鹘男、女供养人像相似。
- (2) 柏孜克里克石窟与莫高窟409窟两处供养人像所表现出来回鹘人的典型形象是：面型长圆，两腮肥厚，鼻梁高挺，柳叶形的眉，鱼形眼，小嘴，身材匀称，端庄挺拔，双腿多是直立，具有稳健勇敢的美感。
- (3) 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供养人也有自身的特点：没有团龙纹出现，没有象征权力的仪仗的出现。

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莫高窟409窟的回鹘王及其侍从的面部，在肉红色的底色上再在两脸颊、下颌、前额等处用赭红色晕染，反映的显然是河西人的面部特征。本文通过上述供养像所体现出来的显著区别判断出，沙州政权与西州政权显然并非一个政权⁽²¹⁾。

刘人铭《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可汗可敦供养画像阐释》一文对供养人画像的描述可以说是十分详备的，其中，将侍从分排介绍或是本文对壁画内容描述的新奇之处。这一篇文章在探讨供养人图像内容时，还提到两个有价值的观点，其一，图像中展现的仪卫制度与龙纹纹饰等因素体现出这一地区与汉文化的融合；其二，409窟回鹘可汗的身份可能是沙州镇国王子，409窟可能是沙州镇国王子的功德窟⁽²²⁾。

刘人铭《敦煌石窟回鹘王像身份属性再思考》主要是对莫高窟409窟、237窟、148窟和西千佛洞第16窟这四个石窟的供养人像作梳理研究。该文中值得提及的关于供养人图像内容的观点为：从上述四个石窟的供养人像、供养人数量、服饰样式、仪仗配置、构图模式和图像元素等方面可以看出，四幅回鹘王夫妇像来源于同一图像粉本，是同一位统治者的写照⁽²³⁾。

汤晓芳撰文《对敦煌409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提出对供养人图像的一些新看法，值得提及的观点如下：409窟团龙纹的龙的形象与考古发掘的西夏太宗李德明的陵墓出土的龙形文物形象相同；另外在仪仗问题的描述上，作者提及《帝后礼佛图》中皇帝身后的翬扇上的龙纹与莫高窟409

石窟的供养人像受唐宋之风影响，其人物形象程式化，不见有本民族的特征，只有409、237窟的供养人像是例外的现象。另本文多次提及这样的观点，即西夏的壁画艺术受高昌回鹘的影响繁多，而鲜少提及所谓的沙州回鹘，似乎与此时沙州回鹘的相关观点还未兴起相关。再者，刘文在尾注之中提及409窟的族属以及时代划分的争议问题，用“北方民族领袖”以回避西夏王/回鹘王的争议问题。

(20) 任怀晟：《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91-92页。

(21) 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409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0-119页。

(22) 刘人铭《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可汗可敦供养画像阐释——以汉文化因素探析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42-146页。

(23) 刘人铭《敦煌石窟回鹘王像身份属性再思考》，《中国美术研究》2021年第2期，第15-23页。

窟王者身后的翬扇上的龙纹相同⁽²⁴⁾。

刘玉权《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一文对409窟壁画内容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看法，他提到，409窟中的云纹边饰不见于前代也不见于后来，而常见于吐鲁番地区高昌回鹘石窟壁画，并流行于唐代时期的新疆地区。他还提到409窟属于11世纪70年代至12世纪初形成的第二种沙州回鹘壁画艺术类型，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是：人物体态健壮，两颐肥硕，柳眉细眼，高直鼻梁，小嘴，同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人物画颇为相似⁽²⁵⁾。

杨富学撰写的《莫高窟409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中也讨论了供养人像的从属问题，提出了两个较为独特的观点，其一，409窟整体的色调为蓝绿，是回鹘文化的特征，而西夏是用红绿以别贵贱；其二，409窟的艺术风格与152窟（回鹘窟）相同⁽²⁶⁾。

沙武田《敦煌写真遯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一文没有关于409窟肖像画内容的具体描述，但探讨了该画像为回鹘写真像的依据。本文认为409窟供养人的图像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产物，所依据的应该是外来的画稿，外来的写真像⁽²⁷⁾。

（2）莫高窟第409窟供养人身份考证相关研究

关于莫高窟409窟回鹘供养人身份考证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但是身份考证不仅与图像本身有关，还与敦煌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西夏王说

西夏王说是石窟最初分期时相伴产生的学术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并没有因为其他说法的兴起而逐渐失去声音。

陈炳应在图像学方面比较赞同刘玉权最初石窟划分的观点，认为409石窟是西夏石窟，相关的供养人图像自然是西夏王⁽²⁸⁾。他更为重要的西夏学说，依据的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考据，总的观点或可大致概括为：西夏自1036年以后就已经攻占敦煌并一直占领，与此同时，沙州回鹘在敦煌的边缘地带有自己的部落，但力量弱小，并受西夏羁縻。虽受羁縻，沙州回鹘仍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以致于能够拥有可汗、王子的称号⁽²⁹⁾。

史金波赞同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但也在图像与历史学层面提出了自身的依据。在图像学上，他提到，其一新疆地区的

(24) 汤晓芳《对敦煌409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西夏研究》2018年第3期，第54-61页。

(25) 刘玉权《沙州回鹘石窟艺术》，载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70-681页。

(26) 杨富学《莫高窟第409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兼评西夏说与西州回鹘说》，《美术大观》2022年第2期，第42-47页。

(27) 沙武田《敦煌写真遯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第43-62页。

(28) 陈炳应的观点可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其所依据的刘玉权的文章是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318页。

(29) 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68-72页。

回鹘供养人图像上并没有和 409 窟对应的团龙纹的出现；其二，409 窟男供养人身后的华盖、翬扇等体现的仪仗规模是皇帝才能使用的规模，西夏存有皇帝，而回鹘只是王，即 409 窟的供养人像“是皇帝而非王”；其三，409 窟与榆林窟 29 窟（明确为西夏窟）的供养像有类似之处。

在历史文献学上，史先生提到最主要的一点是 409 窟供养人像的规格与《天盛新定律令》所记载的皇帝仪仗规模相吻合⁽³⁰⁾。

汤晓芳的观点主要是在图像层面为西夏皇帝说寻找证据支持。其一，409 窟供养人上的团龙纹与黑水城出土的《官员和侍从》的木刻画（明确为西夏王者画像）的相同；其二，团龙纹龙的形象与考古发掘的西夏太宗李德明墓出土的龙形雕刻相同；其三，西千佛洞中回鹘王供养像没有皇帝所用的翬扇，说明回鹘王并非皇帝规格；其四，409 窟王者身后仪仗翬扇绘的龙纹与《帝后礼佛图》中皇帝身后的翬扇上的龙纹相同⁽³¹⁾。

任怀晟的观点主要依据的也是图像上的证据，409 窟供养人与新疆石窟供养人冠帽的样式和佩戴方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且 409 窟供养人与新疆石窟供养人的须眉五官、发式等是不同的。

②沙州回鹘说

沙州回鹘说应该是“沙州回鹘是独立政权”这一学术观点的附属产物，不同于前者西夏学说较难寻找足够的史料证据，持沙州回鹘说的学者总是能够罗列出诸多史料，不过史料运用是否合适还需后来人评判。

汤开建被森安孝夫认为是“沙州回鹘为独立政权”这一学术观点的首创者。汤先生认为，甘州回鹘的势力一直在向瓜沙地区渗透。他比较重要的观点体现在对历史探究上，有两点：其一，瓜州王投降西夏事件是因为甘州回鹘破灭，大量回鹘人涌入瓜沙地区，增强了当地回鹘人的力量，使得瓜沙地区原有的势力平衡打破，回鹘势力击败了曹氏归义军，接管了沙州；其二，他认为沙州镇国王子/北亭可汗等史料可以证明沙州回鹘政权的独立⁽³²⁾。

刘玉权观点经历了一些变化历程⁽³³⁾，但在此提及的是刘先生的最终观点，即坚持沙州回鹘说。在对历史的阐述上，刘玉权采取了上述汤开建对于瓜州王投降西夏的解释，并认为 1036 年西夏没能消灭回鹘势力，回鹘仍然掌控沙州地区。但沙州回鹘后期在西夏的逼迫之下已经很难和宋取得联系，只能向西寻求西州回鹘的帮助。也就是沙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在刘看来就好似沙州回鹘与宋的关

⁽³⁰⁾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2009 年第 4 辑，第 165-171 页。

⁽³¹⁾ 汤晓芳《对敦煌 409 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西夏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54-61 页。

⁽³²⁾ 汤开建《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载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30 页。（原文发表于 1983 年）

⁽³³⁾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73-318 页和《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1981 年第 2 期，第 100-110 页两篇文章持 409 窟是西夏时期洞窟，供养人为西夏王的观点；刘玉权《略论西夏的壁画艺术》，载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14 页一文开始回避 409 窟供养人族属问题；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载段文杰主编《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 石窟艺术》，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 1-29 页；刘玉权《沙州回鹘石窟艺术》，载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70-681 页；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2 页之中，刘玉权变更了之前的观点，认为 409 窟供养人像是回鹘王供养像。

系。刘还根据榆林窟没有晚期窟（下述所分的两个时期）而得出瓜州在晚期已经被西夏严密掌控，而沙州仍在回鹘的控制之下。

在石窟艺术层面，刘玉权将沙州回鹘的石窟艺术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11世纪20年代末至11世纪70年代末、11世纪70年代末至12世纪初，409窟属于后者。刘玉权认为后期形成了一种颇似高昌回鹘时期佛教人物画的艺术风格：体态健壮、面形长圆，两颐丰肥，柳眉细眼，高直鼻梁，小嘴。最后，刘玉权还提出一个石窟艺术上新的发现：409窟中的云纹边饰不见于前代也不见于后来，而常见于吐鲁番地区高昌回鹘石窟壁画，并流行于唐代时期的新疆地区。

李正宇同汤开建一样，并没有直接提及409窟供养像的族属问题。但如果谈到沙州回鹘是否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问题，李正宇先生的观点是绕不开的学术高峰。其一，李先生不同意瓜州王降夏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消失的开始，其认为曹氏归义军毁灭于1036年与西夏的战争中；其二，他认为1036年战争之后，西夏没有占据沙州，沙州也不是西夏治下，而是羁縻下的地方性政权。同时，沙州也不是西州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权。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出，李正宇先生认为409窟的供养人应该是沙州回鹘可汗。

杨富学是“沙州回鹘是独立政权”一说最为坚定的拥护者⁽³⁴⁾，并在其著述中提出了历史学和图像学上的论证。关于409窟甬道供养人像族属问题，杨富学也曾撰文发表看法，然而，在这一问题的历史学考证上，杨先生所列举证据略显不足，甚至部分观点仍有商榷的余地。再者，杨先生的这些论证根本出发点仍然在“沙州回鹘是一个独立政权”这一观点上。对此观点，杨先生除了列举众学者普遍引用的朝贡等史料外，也列举了出自敦煌文书的一些史料⁽³⁵⁾。但正如上文所言，这些史料的年限、史料中所涉及主人公的身份认定都在两说之间，因而并不建议作为确定的材料使用。此外，杨富学先生对于出现在汉文史料中的两位沙州回鹘势力领导者“沙州镇国王子”与“北亭可汗”之间关系的认定，也与学术界其他学者的观点不同⁽³⁶⁾，且对前者的相关记载认定为是在1036年之后不久，而实际上应该是1041年⁽³⁷⁾。综上，杨富学先生关于409甬道供养人像族属问题的判定或仍需讨论。

在图像学上，杨富学先生提出几点论证，其一，409窟整体的色调为蓝绿，是回鹘文化的特征，而西夏是用红绿以别贵贱；其二，409窟的艺术风格与152窟（回鹘窟）相同；其三团龙纹的使用是沙

(34) 杨富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在其一些文章之中均可看见，但并不罗列依据而是以观点证观点，这些文章有：杨富学《9-12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90-100页；杨富学《近年国内河西回鹘研究综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98-1009页。而梳理沙州回鹘是独立政权的历史学上的依据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30页。提供409窟供养人家族问题的图像依据的论文是杨富学《莫高窟第409窟的营建时代与民族属性——兼评西夏说与西州回鹘说》，《美术大观》2022年第2期，第42-47页。

(35) 关于这一部分敦煌文书详情请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36) 详情请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李正宇《悄然淹没的王国——沙州回鹘》，载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9-311页。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仁宗庆历元年（1041）夏四月甲申条：“（曹）瑋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115页。

州回鹘汉化的体现,是其与敦煌文化融合的体现。除了以上这些依据之外,他还根据西夏时期题记的分布情况提出沙州回鹘灭亡时间应该在 1060 年代左右,这就导致其反对刘玉权的石窟分期说,从而认为所有沙州回鹘时期的石窟都应该是刘玉权所划定的早期石窟,而没有晚期石窟。

贾应逸和侯世新更多的是提出图像上的证据,也兼顾了历史学上的证据⁽³⁸⁾。在历史方面上,他们的文章通过《钢和泰残卷》和《世界境域志》的记载认为沙州不在西州回鹘的统治范围之内,从而认为沙州与西州回鹘不属于同一政权,供养人的图像自然不属于西州。

在图像方面,首先,供养人图像上体现出了回鹘人的特征:面型长圆,两腮肥厚,鼻梁高挺,柳叶形的眉,鱼形眼,小嘴,身材匀称,端庄挺拔,双腿多是直立,具有稳健勇敢的美感。但是沙州、西州两地的供养人各有自身的特点:西州的供养人没有团龙纹出现,没有象征权力的仪仗出现。其次,莫高窟 409 窟的回鹘王及其侍从的面部,在肉红色的底色上再在两脸颊、下颌、前额等处用赭红色晕染,这显然反映的是河西人的面部特征。所以图像上的区别也说明两者并非一个政权,409 窟所绘的应该是沙州地区独立政权的回鹘可汗。

刘人铭⁽³⁹⁾的观点是各家观点的集大成。在历史学的角度上,并没有提供太多新的史料依据,仍然是走先证明沙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独立政权然后再证明 409 窟供养人族属的路线。同时,他赞同杨富学“沙州回鹘 1036 年建国”和李正宇“沙州镇国王子与北亭可汗为同一人”的观点。在处理西州回鹘的问题上,又对森安的观点有所认同。

他还提出,回鹘的多可敦制度符合供养人像上的人物关系,西夏无此符合人物关系的制度。他认为,根据木杵文书的记载,沙州回鹘曾受西州回鹘羁縻,但沙州回鹘独立性极强,可独立进贡,且在西州回鹘与喀喇汗王朝征战时,沙州回鹘是独立的,所以,供养人图像是沙州回鹘可汗。

在图像学方面,他提出了三点论证。第一点,莫高窟 409 窟、237 窟、148 窟和西千佛洞第 16 窟这四个窟是一个整体,都有回鹘可汗供养像,且都佩戴了蹀躞带,是与中原服饰的根本区别。西夏遵循的是中原服饰,应该无蹀躞。第二点,与 409 窟同时代的其他洞窟(刘玉权的分期)存在汉人易服回鹘装的现象,这不可能是西夏的规定,体现的应该是回鹘对沙州的有效统治。第三点,409 窟壁画中帷幔与地毯的使用,极具回鹘民族特色,尤其是帷幔的使用不见于此前及之后的敦煌石窟供养像中。

③西州回鹘说

森安孝夫认为沙州回鹘并非独立政权,而是属于西州回鹘的一个地方性政权⁽⁴⁰⁾。其观点与杨富学等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文章的主要论述也在于从历史学层面来证实他的观点。

其基本观点可梳理为:起初回鹘操纵着归义军政权,但是在 11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西回鹘取

(38) 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 409 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10-119 页。

(39) 刘人铭《敦煌石窟回鹘王像身份属性再思考》,《中国美术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5-23 页。

(40)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山口瑞风编《讲座敦煌 2 敦煌的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 年;森安孝夫著,高然译《回鹘与敦煌》,《西北史地》1984 年第 1 期,第 107-122 页;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 15 号,2000 年,第 25 页(中文抄译森安孝夫著,梁晓鹏译《沙州回鹘与西回鹘国》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00 年第 2 期,第 136-146 页)。也参看森安孝夫《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年,第 299-335,361,372-373 页。

代了曹氏，直接控制了沙州。甘州回鹘与辽不睦（辽数次征伐甘州回鹘），沙州与辽常年保持进贡关系。因而沙州与甘州关系并不会友好。帮助沙州势力成长的只能是西州。其文中提到的史料上的支撑，主要是木杵文书里提及西回鹘的疆域东至沙州，其余的更多是对他人观点的反驳。

沙州回鹘说应该是“沙州回鹘是独立政权”这一学术观点的附属产物，不同于前者西夏学说较难寻找足够的史料证据，持沙州回鹘说的学者总是能够罗列出诸多史料，不过史料运用是否合适还需后来人评判。

他所提到的图像材料也基本包括在前面提及的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和高昌北大寺中的供养人像，以及西千佛洞 16 窟“回鹘可汗供养”题字的壁画，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是最好的证据。

持此观点的还有孙修身，在他的文章之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409 窟供养像的族属问题，而是在历史层面为西州回鹘说提供依据⁽⁴¹⁾。他直接否认了西夏说与沙州回鹘说的立说根据，认为 1019 年前后（依据木杵文书⁽⁴²⁾），沙州已为西州回鹘通过武力手段从归义军政权手中夺取，归义军政权也已经被迫东移至瓜州，因此 1030 年瓜州王降夏事件与沙州无关。不过，学术界对孙的观点认同度似乎并不高。

其所依据的历史史料主要是木杵文书、《西夏书事》中记载的西夏疆域其他州易名而沙州没有易名、西州事宋但沙州事辽等，从而得出上述观点。

钱伯泉先生的观点在上个世纪确实有些奇特，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在文章之中所传达的观点诸多已经陈旧。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提及 409 窟的供养人画像族属问题，只是其对历史的梳理体现了沙州回鹘的一些观点。

前文的观点可以认为是沙州回鹘自有其名称开始就是指安西回鹘，龟兹回鹘。但却并非是西州回鹘，因为西州回鹘已经从安西回鹘分散。因而沙州回鹘的可汗自然是龟兹回鹘的可汗，亦即安西回鹘的可汗⁽⁴³⁾。

3. 莫高窟 409 窟供养人回鹘文题记释读

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最全面的研究以松井太为首，他于 2017 年出版的著作《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中对敦煌石窟中的 281 条回鹘文题记进行了释读研究，其中包括了对本文讨论的 409 窟回鹘供养人题记的解读⁽⁴⁴⁾。在本著作的序言部分，松井太表示在第 409 窟中回鹘王人像题记中读到了西州回鹘可汗称号中频繁出现的 *el arslan xan* 一称号，并提出，其对莫高窟第 148 窟和榆林窟第 39 窟供养人回鹘文题记（即著作中的 36、265、267、268、270 号题记）中称号的解读取得了新进展，虽然进展不多，但依旧期待今后的学者在研究沙州回鹘统治者、试图贴近当时的真实状况时，能利用到这些成果⁽⁴⁵⁾。

(41) 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具》，《敦煌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第 37-43 页。

(42) 现存回鹘文木杵文书共有五个：德国探险对在吐鲁番所获 M1K III 4672, M1K III 7295, M1K 7279；吐鲁番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65G0054 号木杵文书；英藏 Or. 8211/1787 号木杵文书。

(43)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第 63-78 页。

(44)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府中（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161 页。

(45)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

回鹘文题记一直是作为 409 窟回鹘王供养人身份的证明材料而存在, 诸多文章在支持、反驳回鹘说的时候都会使用。除了森安孝夫此前的文章未有提及, 其余多数文章在谈到 409 窟题记时都引用了松井太的相关成果, 只是最终的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松井太目前支持森安孝夫的相关观点, 但他也坦言还需要看到最新技术下题记的研读成果。

敦煌石窟的题记, 因光线较暗和字迹模糊不清等原因, 使用普通光识别难度较大。因此, 敦煌石窟中的多个不同文字的题记还未全部收录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就如松井太所说, 不久将来使用最新技术, 有望补充并完成其余还未进行识读的回鹘文题记的研究。

莫高窟 409 窟回鹘供养人题记位于主室东壁南侧“回鹘王”供养像北侧(左上方)、“回鹘王”供养像前方高度约 132 厘米, 宽度约 10.5 厘米的区域。题记上方约 52-65 厘米处可见两行题记。

松井太解读的题记内容(松井 2017, 第 36 号):

1. el arslan xan 颉=阿思兰=汗

2. män sävg(i)--- 我娑匍克.....

其中 arslan, 松井太认为是“-L-”后添加词钩位置时弄错了。并提出字体并非是西回鹘时代的半楷体, 而是蒙古时代文献的“工整草书体”(46)。

持西夏说观点者, 从题记的字体出发, 认为蒙元时代的题记不一定是回鹘人, 可能为其他民族所书写, 参见上述持西夏说观点的任怀晟文中。持沙州回鹘说者主要是从阿斯拉汗(即狮子王)的称号并非西州回鹘独有, 而是具有民族普遍性, 来否认据此为证的西州回鹘说, 这种观点可见于上述杨富学、刘人铭的相关文章之中。然而 il alsran xan (颉=阿思兰=汗)这一解读是有误的。

笔者在 2021 年 6 月 10 至 16 日、2022 年 5 月 14 日至 17 日和 2022 年 6 月 9 日至 12 日曾赴敦煌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 经使用紫外光发现多个前人还未进行解读和研究的回鹘文题记【参看图 1】。409 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位于主室东壁南侧回鹘王左上方题记框内, 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松井太解读的 arslan xan 和 män sävg(i)有误, 通过紫外光可识别出的回鹘文有 12 个词, 第 1 行明显里有 9 个词, 第 2 行中确定有 3 个词, 但一定还有几个词。笔者对其进行的释读如下:

成》, 府中(东京): 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4, 33, 131, 132 页。莫高窟 148 窟 36 号题记: [tn]grikän qu[t] [t]utmiš t(ng)ri-----“圣神的, 获得天宠的-----”; 榆林窟第 39 窟 265 号题记: el'ögäsi sangun ögä bilgä bäg qutı-ning körmış ätöz-i bo ätür qutluğ qıvlıy bolmaqı bolzun yamu “这是宰相(el'ögäsi) Sangun Ögä Bilgä Bäg 阁下之真影。愿他能得到上天之宠而幸福!”; 同 267 号题记: tngrikän oğşayı qatun tngirim körki bo ätür qutluğ qıvlıy bo(l)mağı bolzun “这是 Oğşayı 可敦陛下的肖像, 愿她幸福吉祥”, 同 268 号题记: šenkuğ tngirim-ning körki bo ätür “这是 Šenkuğ 公主像”, 同 270 号题记: küsänčüg buyruq kisisi čobı vušin körki ol “这是 Küsänčüg 梅录(buyruq)的妻子 Čobı 夫人(vušin)像”。也参看松井太《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 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211-214 页。

(46)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関する劄记(二)》, 《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 32 号, 第 27-30 页; 松井太著, 刘宏梅译《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劄记(二)》, 《吐鲁番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117-127 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语、モンゴル语题记铭文集成》, 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 府中(东京): 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54 页。



图1 莫高窟第 409 窟，主室东壁门口南侧榜题紫外光照片(敦煌研究院提供)

题记换写和转写：

汉译：

1. 'yl 'lmys twñ t'kyn 'ydwq t'ñkry kwrky 'wl

el almiš tun tegin iduq tängri qutï körki ol

(这)是 El Almiš Tun Tegin iduq tängri qutï 像。

2. s'ky[] ykrmy? bysd'

säki[zinč aynñg] y(e)g(i)rmi bešdä

于八月二十五日。

注释：

1a, el almiš tun tegin iduq tängri qutï：直译为“掌控国家的长王子圣天陛下”，这显然是 409 窟供养人像中的“回鹘王子”的名字和称号。

el 意为“国家，人民”；almiš 由动词 al- 和构形词缀 -miš 组成，意为“拿的、掌控的、占据的、拿下的”等意。al- 可表示：拿下、攻下、占有等个意思，el almiš 字面意思可理解“掌控国家或人民的”【参看图 2】，这一称号或是汉文史料中出现的回鹘“镇国王子”的回鹘语称号，但暂无法考证。el almiš 这一称号不见于漠北回鹘和高昌回鹘的统治者称号中，然而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信件中四次，森安孝夫把 el almiš 翻译成“taking a state,” 提出把它不直接翻译，作为回鹘贵族称号对待。如：U 7252, tängrikän el almiš alp qutluγ [tegin] tängrim “圣神的 El Almiš 英勇吉祥的王子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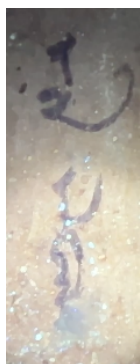


图 2
el almiš



图 3
tun tägin



图 4
ïduq täng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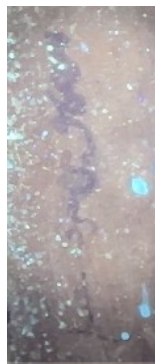


图 5
qutï körki 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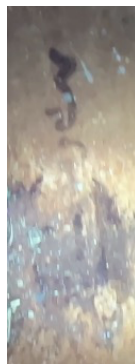


图 6
S'KY[]



图 7
y(e)g(i)rmi bešdä

Or. 12207 和 Ot.Ry. 2687, el almiš sangun “El Almiš 将军”；敦煌出土的 Or. 8212/179, el almiš tarqan “El Almiš 达干”⁽⁴⁷⁾。本题记出现的 el almiš tun tägin ïduq tängri qutï 这一称号的形式与漠北回鹘和高昌回鹘时期可汗称号十分接近，el almiš 是回鹘供养人的称。

el almiš 与漠北回鹘和高昌回鹘时期出现的可汗称号 el tutmiš（音译为“頡咄登蜜施”，直译为“统治国家的”）十分相似。el tutmiš 这一称号在 J. Hamilton 哈密顿研究的 P. 3049 号敦煌文献中以 kün tängriḡä qut bulmiš ärdämin el tutmiš alp qutluḡ uluḡ bilgä uyḡur tängri uyḡur xan⁽⁴⁸⁾，在德藏吐鲁番出土第三号木杵文书 MIK III 7279 号中以 kün ay tängriḡä qut bulmiš uluḡ qut ornanmiš alpīn ärdämin el tutmiš alp arslan qutluḡ köl bilgä tängri xan 的形式出现⁽⁴⁹⁾。在 Ot.Ry. 1984 号回鹘文信件中也出现 el tutmiš 这一称号⁽⁵⁰⁾。森安孝夫首次提出“沙洲镇国王子”中的“镇国”是 el tutmiš 的翻译，并指出柏孜克里克 19 窟以及北庭西大寺回鹘文题记中都出现 el tutmiš 这一称号⁽⁵¹⁾。

(47) T. Moriyasu, *Corpus of the Old Uy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 (Berliner Turfantexte XLVI)*, Turnhout: Brepols, 2019, pp. 76, 85, 188–189, 82.

(48)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Peeters, 1986, pp. 42–43. 回鹘可汗称号相关研究请参见：V. Rybatzki, “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 2000, pp. 205–292; Y. Kasai, “Uyghur Legitimation and the Role of Buddhism,” in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Vol. I, edited by C. Meinert and H. H. Sørensen, Leiden: Brill, 2020, p. 67; J. Hamilton, “Remarks Concerning Turfan Stake Inscription III,” in *Turfan Revisited*, edited by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Berlin: Dietrich Reimer, 2004, pp. 121–124.

(49)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31/32 合併号，1991 年，第 184 頁；T. 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p. 224; T. Moriyasu, “Uighur Buddhist Stake Inscriptions from Turfan,” in *De Dunhuang à Istanbul: Hommage à James Russell Hamilton*, edited by L. Bazin and P. Zieme, Turnhout: Brepols, 2001, pp. 186, 188.

(50) T. Moriyasu, *Corpus of the Old Uy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 (Berliner Turfantexte XLVI)*, Turnhout: Brepols, 2019, p. 139.

(51)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 2 敦煌の歴史』，大东出版社，1980 年，第 336 頁；森安孝夫《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年，p. 331, n. 47.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5 页，采这个看法，把 P.3049 号的 kün tängriḡä

tun tägin 意为“皇长子、大王子”等意。tun 为“长子、第一个孩子、首个”，tägin 为“王子”，音译“特勤”【参看图 3】。tun 在回鹘文文献中，作为人名的一部分出现，例如：tun oγul baš oγul inanč sangun, tun-čor, tun bars tāmūr⁽⁵²⁾。tun tägin 一人名，或可读作 tuγ yegän，后者在回鹘语中更为常见。

īduq tängri qutı 意为“圣神的上天的福泽殿下（陛下）”【参看图 4, 5】。īduq 圣神的，关于 īduq 一词的构成，现在统一的看法是来自动词 id- 派遣，派送和构词词缀-uq, īduq 表示上天的恩宠。tängri 意为上天、神，神圣的。亦常作为回鹘可汗和贵族称号的一部分出现，可表示尊敬的、光荣的，殿下等意思。

1b, körki ol : “（这）是……的肖像”的意思，在敦煌吐鲁番供养人题记常出现【参看图 5】。

2, säki[zinč aynıng] y(e)g(i)rmi bešdä : “八月二十五日”。第一个单词后半部分破损，松井太解读这个词为 sävg(i)，现在清晰看到 S'KY[...] 或 SYNK[...]【参看图 6】。回鹘文题记一般有年份或月份的纪年，破损部分按照前面的内容补充为 säki[zinč aynıng] “第八月的”。第二行末尾的第二个单词或为 Y'MW 或为 YKRM Y，第二行若是年份的话应该是 YKRM Y = y(e)g(i)rmi “二十”，音字形问题还存疑问。bešdä “在……五日”，由数字 beš 和位格后缀 -dä 组成【参看图 7】。

4. 余论

莫高窟第 409 窟以外，回鹘王供养像在莫高窟 61 窟、231 窟、148 窟和西千佛洞 16 窟都有出现。回鹘题记以草书体书写，体现出晚期回鹘文的特点。两行回鹘文题记虽然写在榜题框里但是从字体等来看，可以确认是后人所写。榜题框底层应该写有榜题，但是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到更底层的榜题。关于莫高窟第 409 窟中回鹘文题记的字体，松井太提出并非是西回鹘时代的半楷体，而是蒙古时代文献的“工整草书体”，笔者赞同松井太的这一观点。关于供养人的身份问题，如果壁画中的人物是沙州镇国王子，那么按照史籍他是 1042 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贡，生活在 1042 年前后。关于 el almiš tun tegin īduq tängri qutı 这一称号，是否是“镇国王子”还有待考证。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409 窟的供养人是回鹘贵族成员，el almiš 是回鹘贵族常见称号之一。元代有朝圣者写下这个回鹘文题记并辨认该壁画人物为回鹘王子。

附记 本文系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11）；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21BZS025）；兰州大学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1l1zujbkytd004）

qut bulmiš ärdämin el tutmiš alp qutluγ uluγ bilgä uyur tängri uyur xan 译作“在天界寻求幸福的镇国王子合·骨咄禄·羽禄·毗伽·回鹘天王”，即认为 el tutmiš 是汉文史料中的“镇国王子”，即沙州回鹘。

(52)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 J. Wilkens,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21, p. 757;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Peeters, 1986, p. 57;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31/32 合併号，1991 年，第 190 頁；T. 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p. 230;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语、モンゴル语题记铭文集成》，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府中（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8 頁。

A Study on the Old Uyghur Wall Inscription of the Donor Portrait of Cave 409 of the Mogao Grottoes

Tursunjan IMIN and Abdurehim RUSTAMJAN

Abstract: In 1982, Takao Moriyasu, a Japanese scholar, first suggested that the portrait of the male donor in Cave 409 of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belonged to a king of the West Uyghurs. In 2000,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reaffirming his stance, citing similarities to Uyghur donor portraits in the Bezeklik Caves of Turfan, Xinjiang. In 2006, he deciphered an Old Uyghur word *il* (~ *el*) in the inscription attached to the donor portrait in Cave 409, and dated the inscription to the West Uyghur period. In 2014, Dai Matsui further deciphered the Old Uyghur inscription as *el arslan xan män sävg(i)*, leading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a visitor named Sävgi had visited Dunhuang during Mongol times and identified the portrait as that of the West Uyghur king, *El Arslan xan*.

As a result of our fieldwork and ultraviolet photography, we were able to detect more words in the inscription and revise Matsui's previous reading. In particular, the name of the Uyghur king should be modified to *el almiš tun tägin iduq tängri qutı*. This revision is minor but provides a solid base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Uyghur King in Cave 409.